

【西部大开发】

组织创新与西部开发

——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角度的思考

费明德, 李斌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工具和思想分析西部开发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的迫切性。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西部开发与发展是一个在不同角点均衡间演进的过程,西部适宜的发展模式应当通过鼓励全社会的组织试验和创新获得。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支持并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

关键词:西部开发;新兴古典经济学;组织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1)01-0016-05

西部大开发已经成为目前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近期也产生了大量相关文献。但从这些文献所使用的理论工具来看,还几乎无人利用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的思想来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发现,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许多精彩思想对分析西部开发思路都极具借鉴力,关于“组织创新”、“组织试验”的系统思想就是其中之一。组织创新是西部开发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作为目前主流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被用来分析“组织创新”时,显得力不从心;新制度经济学又因为缺乏形式化表达而难以进入主流经济学。因此,尝试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工具和思想分析西部开发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的迫切性。本文试图从新兴古典经济学角度探讨组织创新与西部开发问题。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与组织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森(S. Rosen)、贝克(G. Becker)、杨小凯、博兰(J. Borland)、黄有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试图以现代分析工具复兴古典经济学思想,发展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学派的核心是建立在角点解基础上的超边际分析^①。他们指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资源既定的假定下,研究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

收稿日期:2000-06-16

作者简介:贾明德(1960-),男,陕西合阳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斌(1976-),男,河北石家庄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角点解是指某些决策变量取其最大或最小值,内点解是指所有决策变量都不取其最大和最小值的解。

配到竞争性的用途中去,也即资源配置问题,运用的是以内点解为特征的边际分析。但是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研究的中心是分工与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核心思想是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决定于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这些精彩思想被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忽略掉了,原因在于对分工问题的形式化研究必然涉及到对角点解的处理^①,而这种方法在马歇尔建立新古典经济学时在数学上还无法解决。因此,上述思想虽然精彩,但因无法形式化而失去了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机会。随着数学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了能够处理角点解的工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利用非线性规划方法将古典学派中的分工思想数学化,用不同的角点均衡代表不同的分工结构和经济组织,发展出了超边际分析。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中既包括资源分配问题,又包含经济组织问题,在这里资源稀缺程度本身是不固定的,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增加财富,但又可能令交易费用增加,从而构成一对两难冲突(trade off),这成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可见,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经济学更注重“国富”这一问题,更有利于分析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问题,同时由于这一学派以分工发展与交易费用之间的消长为研究主线,以角点解的超边际分析为手段,从而能够把当代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挑战和批判的交费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都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也成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不同侧面。这些都大大加强了这一学说对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崭新视角和工具。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在以角点解代表的决策模式既定的条件下才涉及到资源配置问题,而个人首先面对的是在不同的决策模式中进行选择,以最优化其目标效用函数,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参数条件下,不同的决策模式(角点解)会带来不同的效用水平,理性要求个人选择效用水平最高的角点解。在市场上,多个人的自利行为选择及其交互作用会形成不同的组织结构,如自给自足结构和分工结构,每个结构都有一个角点均衡,这一过程需要通过瓦尔拉斯负反馈机制确定价格来完成,而全部均衡就是效用最大的角点均衡。

杨小凯进一步指出,社会分工水平决定专业知识积累的速度和人类社会获得技术知识的能力,而人们对最优分工水平的知识决定均衡分工水平[1]。最优分工水平的知识来自何处呢?一方面是每个人对每个角点解的求解,另一方面是全社会对每个角点均衡的求解。可见,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与角点解和角点均衡的变化相联系,表现为对个人而言选择新的角点解,对社会而言从一个角点均衡向另一个角点均衡的演进,这就是一个组织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个人和社会求解以发现真实收入水平更高的角点和角点均衡的努力分不开的^②。[1][2]

① 如一个社会中有两种产品 x, y , 当某人专业化生产 x 时,他对 y 的劳动投入和产出量就为 0, 此时角点解就出现了。

② 杨小凯(1997)举了麦当劳连锁店创立和发展的例子来说明角点决策和组织创新问题。在麦当劳创立前,饭馆的价格很高,下馆子的人很少,市场对饭馆的需求也基本与供给相当,形成一种均衡状态。按传统经济学观点这时市场已处于均衡,创办更多饭馆只会造成损失。但麦当劳创办人则认为可能存在另一种市场均衡,即服务低价、饭馆规模扩大、专业化加深从而成本下降、消费者需求大大增加。麦当劳按这种思路开始走低价和大规模连锁经营的路子,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组织创新的典范。

二、组织试验、经济发展与风险分担

人类获得最优分工水平的知识依赖于对新角点解计算获得的信息,但是这种计算不但本身需要时间和费用,而且对于有分工的角点均衡,人们还要花时间议价或通过择业自由,瓦尔拉斯负反馈机制确定价格,才能计算出角点解的真实收入。可见,人类对社会分工知识的积累速度依赖于议价和计算角点解的费用高低,亦即人们对一种新的角点均衡状态好坏的判断,必须通过由价格制度组织的社会试验来获得,不通过组织试验我们无法获得不同角点均衡的信息。而当人们能够获得这些知识的时候,就会选择更有效的分工结构和经济组织,从而产生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研究还表明,在不同的条件下和时段里,经济增长会以不同的模式出现,会发生经济起飞现象甚至非连续的跳跃式发展^① [3]。

进一步看,既然要进行组织试验,就必须有充分的资本支持。而且试验本身意味着不确定性,许多试验都会失败,要求社会有一种分担风险的机制,资本市场就是全社会帮助企业分担组织试验风险的制度。这些制度保证了全社会组织创新的活力,这种活力又保证了全社会对组织信息的获得以及由此向更有效的均衡状态的自发演进。

三、组织创新与西部大开发

西部是中国的欠发达地区,西部大开发究竟应采取怎样的主导思路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西部的开发与发展是一个在不同的角点均衡间演进的过程,现在有人提出所谓“跳跃式”发展思路,实质就是在角点之间的非连续的大幅度跃变。可以说目前西部就正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角点均衡状态,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低、交易量和交易效率不高,市场很不发达。而且这种均衡可能表现出两方面的特性,一是会具有发展经济学贫困陷阱理论中稳态点的性质,即在均衡点周围的一定范围内会有一种自动趋向原均衡点的力量[4][5];二是即便有人不满意于原有均衡状态,一定条件下经济理性也会促使他在实际行动中去选择维护原有均衡^②。事实上上述两种表达说明的是同一个意思,即在脱离原有低水平均衡过程中,必须有足够有力的推动力量。在已有理论中,类似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思路中,如纳克斯(R. Nurkse)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R. R. Nelson)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以此为重要依据形成的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理论和利本斯坦(H. 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一个重大区别是,这些理论强调的是国家主导的大推进工业化以及国有企业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它们的形成来源于30年代的大危机和原苏联30年代和我国50年代工业化经历的支持。杨小凯等(1999)对上述思想进行了批驳,指出苏联式的通过模仿发达国家成功工业化模式和侵犯私有产权而实现的国家主导大推进模式,虽然短期内效率较高,但计划经济限制了自由的组织创新,一旦模仿的潜力耗尽,其长期负效应就会超过短期效应[6]。相反,17世纪英国的崛起得益于经济自由主义,近代香港的发展模式又正是早期英国模式的翻版,60~70年代台湾模仿香港的模式在市场和私有产权基础上实

^① 详细内容参见杨小凯(1991,1998)关于分工内生演进和内生经济增长的论述。

^②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在一群挤公共汽车的人中,很可能会有人甚至是不乏人更向往有秩序地排队上车,但当看到其他人都挤车时他也会去选择挤车。

现了大推进工业化,由此可见自由主义政策制度下组织创新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①。事实上,社会之所以要进行组织试验,就因为社会对组织的信息是有限的,同时组织试验能够保持一个社会创新的活力。而既然是“试验”,就意味着人们不可能在事先就有充分的计划和预测,因此不应依赖少数“精英”的事前设计。

建国以后,西部发展曾经有过两次高潮,但那都是通过计划主导的工业化,在当前我国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西部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思路。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我们认为,西部的开发和发展至少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央政府一定的政策倾斜是必要的,其实质在于通过政策力量改变原有的经济环境,从而产生资本引诱(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没有一定的“政策资源补给”,西部大开发就缺少了前提和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开发是必须由中央政府来组织实施的[7]。

第二,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可以为西部开发提供前期的制度保证,但长期看,西部如何找到一个适宜的发展模式以保证其稳定快速发展,实现从低水平角点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状态的演变,则不是中央的倾斜政策所能给予的。人类社会不同地域发生的组织试验是可以模仿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获取组织试验信息的捷径,可以降低试验所冒的风险。台湾可以模仿香港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取得巨大成功,具有广阔国土的西部因其特殊的区位地理及人文环境特征却使其很难模仿某种现成的发展模式。但是,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地区的一个共同特征却很值得模仿,那就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转轨时期的西部大开发没有先例,个人和社会都必须进行很多的角点计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鼓励社会的组织试验,不断积累组织知识。而要实现有效的组织试验,就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保护其产权的基础上,鼓励他们自由地进行组织创新,一些在东部未曾有过的组织试验,也完全可以允许在西部来进行。政府不要总是希望通过预定的模式来实现西部大发展,而应努力完善市场环境,降低交易费用来促进分工发展。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推进,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会发展,生产效率也会不断提高,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会出现起飞增长甚至大幅度的跳跃式发展。因此,长期来看西部的开发和发展依赖于自由市场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以及通过大量来自经济主战场上的组织试验探索出的发展模式而实现的从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跃变,一些学者提出的“跳跃式发展”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自发实现^②。

第三,西部开发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支持并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组织试验和创新要求有充分的资本支持,同时社会能够分担试验失败的风险,而且只有在资本推动力足够大的时候才可能完全摆脱原有均衡状态的束缚。这要求:(1)国家应大力增加在西部的投入。国家投资应当集中在对如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经济硬环境的改善以及军工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产业上,尽量避免涉及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由于其企业产权的特性,还难以成其为严格意义上的“企业”[8],西部国有经济的战线还须进一步缩小;(2)大力发展西部的金融市场,给予一定的金融倾斜政策,增加西部企业上市的数量,建立有效的融资和风险分担机制,同时鼓励对新模式新机制的研究和探索。

^① 杨小凯(1999)还进一步指出,随着分工深化,均衡的分工网络和协调失败的风险会同时提高,风险有时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不能因此怀疑市场机制。正因此,以 Sachs 的观点来看,某种程度上说,30 年代的大危机是一种“成功的危机”。

^② 杨小凯通过研究就曾预言,中国内地在 21 世纪的头 50 年里一定还会有一个大推进工业化的高潮。

参考文献：

- [1] 杨小凯. 经济学原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2] 杨小凯. 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3] Yang, X., and Borland, J.,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460-482.
- [4] Barro, R., and Sala-I-Martin, X., *Economic Growth*, Mc—GrawHill Inc., 1995.
- [5] Neher, P., *Economic Growth & Development, A Mathema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1.
- [6] 杨小凯, 张永生. 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导论[J]. *经济研究*, 1999, (7).
- [7] 李 斌, 龚 勃. 西部大开发中引资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论证[C].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0.
- [8] 贾明德, 李 斌. 企业产权新论[J], *学海*, 2000, (1).

[责任编辑 卫 玲]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Regions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JIA Ming-de, LI Bin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it is very urgent and important to study western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using the tools and thoughts of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Viewed from this new angle, western development is a process in which evolution occurs between different corner equilibriums. Therefore, an appropriate way of western development can come true by urging organization innovations throughout the society. In this process, it is essential to provide adequate capital support and to build up effective mechanism of risk share.

Key word: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Regions;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 11 届年会暨西部经济发展与企业管理创新国际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由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北大学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 11 届年会暨西部经济发展与企业管理创新国际研讨会于 2000 年 10 月 28~30 日在西安召开。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肖灼基、何炼成、张宇燕、左大培等国内外学术界 200 多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我国西部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战略和企业管理创新进行讨论,并在某些问题上达成相对共识。

(海 蓝)